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 历史主动精神的理论意蕴与实践要求

□ 刘同舫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指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伟大的历史主动精神、巨大的政治勇气、强烈的责任担当,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贯彻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统揽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出台一系列重大方针政策,推出一系列重大举措,推进一系列重大工作,战胜一系列重大风险挑战,解决了许多长期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难题,办成了许多过去想办而没有办成的大事,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成就和变革,就要把握“历史主动精神”这一关键词,明确历史主动精神的理论意蕴与实践要求,以强烈的历史主动精神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展现新气象新作为。

## 历史主动精神是唯物史观的内在要求

中国共产党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无产阶级政党。历史主动精神是唯物史观的内在要求,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在科学理论指导下深刻把握历史演变规律、顺应历史发展大势、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的责任意识与使命担当,展现了中国共产党掌握斗争与发展的主动权、奋力开辟美好未来的宝贵品质。

历史主动精神是坚持遵循客观规律与发挥主观能动性相统一的需要。马克思主义认为,历史的本质是人类实践的过程,历史的发展遵循自身内在的、固有的客观规律,这一客观规律表现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相互适应的辩证运动过程。历史规律是客观存在且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但人类在客观规律面前并非无能为力,把握历史发展规律并加以合理利用,体现了人类认识和改造客观世界的的能力。中国共产党弘扬历史主动精神是尊重历史发展客观规律的需要,唯有不断深化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在尊重客观规律的基础上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即创造性地开展实践,才能正

确认识和改造客观世界,不断提升中国共产党践行初心、担当使命的能力。遵循客观规律能避免走错路和走邪路,发挥主观能动性能少走弯路和少走老路。只有坚持遵循客观规律与发挥主观能动性相统一,才能持之以恒地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

历史主动精神是推动历史发展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统一的需要。唯物史观将人作为历史的主体与创造者,把实现人的自由和解放作为世界历史的最终目的。马克思指出,在“人的自我异化的神圣形象”被揭穿后,人类在通往自由道路上的现实任务就在于揭露“非神圣形象的自我异化”,挣脱一切由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加之于个人身上的枷锁,这是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我们在顺应历史发展规律的基础上更应主动作为,正如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言,把握了历史发展规律虽不能“跳过”或“用法令取消自然的发展阶段”,但却可以缩短和减轻共产主义“分娩”的阵痛,加快人类通往自由解放的进程。实践就是贯通历史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桥梁。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开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是既合乎历史发展客观规律,又能为实现人类自由解放的终极目标创造条件的科学社会主义实践。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中弘扬历史主动精神,推动历史发展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相统一,是遵循社会主义发展客观规律并确保党的伟大事业成功的重要保证。

历史主动精神是唯物史观理论精髓在当代中国的运用和展开,经得起时代变幻和历史发展的检验。只有牢固树立历史主动精神,才能从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奋斗历程中破解过去我们为什么能够成功的密码、弄明白未来我们怎样才能继续成功的真谛,才能真正掌握历史发展的主动权。

## 发挥历史主动精神铸就百年大党辉煌

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将历史主动精神贯穿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始终,有力解决了不同历史时期党面临的主要任务,先后创造了新民主

主义革命的伟大成就、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成就、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成就、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彻底改变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途与命运,书写了百年大党的辉煌与成就。

历史主动精神蕴含于中国共产党缔造的以伟大建党精神为源头的精神谱系之中,串联起党领导人民斗争和发展的百年历程。百年来,党坚持性质宗旨,坚持理想信念,坚守初心使命,勇于自我革命,在生死斗争和艰苦奋斗中经受住各种风险考验、付出巨大牺牲,锤炼出鲜明政治品格,形成了以伟大建党精神为源头的精神谱系,锻造出井冈山精神、延安精神、大庆精神、“两弹一星”精神、改革开放精神、抗震救灾精神、抗疫精神、脱贫攻坚精神等伟大精神。这些精神标识具有深刻的时代印记与独特的理论内涵,在不同历史时期支撑和推动着中国共产党的伟大事业砥砺前行。历史主动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中所有伟大精神的共同特质,铭记着百年来党在明确历史方位和发展任务的基础上,以科学理论为指导,以强烈的责任担当,在为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实践中,在改变物质世界的同时,主动构筑美好的精神世界,丰富和发展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精神宝库。弘扬历史主动精神,我们党把这些宝贵精神财富深深融入中华民族血脉之中,使中国人民的精神面貌发生巨大变化,为民族复兴提供了强大支撑。

历史主动精神是中国共产党在激烈的革命斗争和错综复杂的发展竞争中始终占据主动,推动党的伟大事业不断获得成功的关键因素。弘扬历史主动精神,党须在历史的重重大关头做出一系列科学决断。在维新变法、辛亥革命等多次救亡图存运动失败后,围绕“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一群先进的知识分子选择马克思主义和人民至上和社会主义道路,给历经苦难的中国人民带来光明与希望,使中国革命的面貌焕然一新;在轰轰烈烈的大革命遭遇背叛和挫折后,面对中国革命究竟是照搬苏联模式还是立足于国情自主选择,党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

夺取政权的正确革命道路,革命的星星之火速成燎原之势;“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在党和国家面临何去何从的重大历史关头,党深刻认识到,只有实行改革开放才是唯一出路,否则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党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党和国家工作中心战略转移,实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任在深刻把握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的基础上,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论断,标注了我们党发展新的历史方位,明确了新时代党面临的主要任务,在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全面从严治党、经济建设、全面深化改革、政治建设、全面从严治党、外交工作等方面取得历史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历史反复证明,只有充分发挥历史主动精神并不断凝练,形成破解现实难题的思路方法,将内在精神转化为认识和改造世界的伟大力量,主动把握、积极顺应历史发展大势,才能确保党和国家事业始终走在正确道路上并不断取得新胜利。

## 以强烈的历史主动精神开辟发展新境界

历史并不仅仅继承和延续以往创造的物质财富,也赓续和发展此前涵蕴的精神财富。在总结经验中把握并合理运用规律,是中国共产党不断带领中国人民从胜利走向胜利的秘密。走好新的赶考之路,实现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宏伟目标,需要我们大力弘扬历史主动精神,不断开辟新时代发展的新境界。

植根人民群众,站稳人民立场。人民群众是生成历史主动精神的基础。一部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史,就是一部党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的奋斗史。中国共产党在新时代弘扬历史主动精神,必须始终与人民群众站在一起,始终以维护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只有时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才能真正

掌握历史发展的主动权,从人民群众中汲取源源不断的精神力量,克服一切困难而无往不胜。弘扬历史主动精神,就要把握新时代的历史方位,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把持续保障和改善民生、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维护社会公平正义、解决人民群众切身利益诉求等作为践行初心使命的现实着力点。

把握重要战略机遇期,掌握发展主动权。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发展仍然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但机遇和挑战都有新的发展变化。弘扬历史主动精神,就要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深刻认识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带来的新特征新要求,深刻认识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带来的新矛盾新挑战,增强机遇意识和风险意识,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围绕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任务,保持战略定力,办好自己的事,认识和把握发展规律,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在前进道路上可能遇到的问题和风险挑战上,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迈向更高水平。

把握世界大势,引领时代潮流。历史前进的实践需要催生了谋求发展的精神力量。在坚实的实践基础上,弘扬历史主动精神,能够生发出主动性、自觉性、创造性等品格。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和世纪疫情交织叠加,弘扬历史主动精神,就要充分认识到人类命运与共的时代特征,把握世界历史发展的大势并自觉承担历史赋予的使命;统筹好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倡导者和维护者;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创造和平稳定的外部环境;不断推进理论和实践创新,在关于世界和平与发展思想、理念和方式方法上推陈出新,积极拓宽中国现代化道路和着力构建人类文明新形态,为世界和谐稳定发展贡献更多中国智慧和力量。

(作者系浙江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浙江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指出:“党领导人民成功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政治学既是追求有序公共生活的学问,也是治国理政离不开的思想宝库。当前,中国政治学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基于中国式现代化实践,构建一套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政治学知识体系,打造易于为国际社会所理解和接受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引导国际学术界客观真实地认识中国。

改革开放之初,中国政治学恢复重建。当时,国外政治学理论蜂拥而至,20世纪80年代的“现代化理论”,90年代的“自由主义理论”,以及进入21世纪之后的具有西方本土经验的“治理理论”被译介到中国。学科重建之初,由于自身知识积累和学术创新能力较为薄弱,译介西方理论成果有一定必要性。然而,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大量政治学理论,是在美国政治学知识体系主导下进入中国的,并以其概念、框架和方法来解释中国现代化实践,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学术界对中国问题的独立思考能力。

事实上,通往现代化的道路多种多样,决不只是欧美发达国家一种模式、一条道路、一个标准。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些理论观点和学术成果可以用来说明一些国家和民族的发展历程,在一定地域和历史文化中具有合理性,但如果硬要把它们套在各国各民族头上,用它们来对人类生活进行格式化,并以此作为裁判,那就是荒谬的。”中国政治学研究要真正提出中国问题、给出中国解决方案,就必须立足中国式现代化,努力构建中国政治学标识性概念,通过概念进行概括、分析、判断和推理,进而形成完整而严密的话语体系,在世界学术格局中作出特有贡献。

概念是运用专业学科知识持续不断地进行学术研究的产物,是对事实或理论的概括,是构建话语体系和知识体系的重要基础。当下,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界已产生和供给了一批有效的政治学概念,比如,国家治理现代化、全过程人民民主、协商民主、自我革命、大一统政治、使命型政党、服务型政府、贤能政治、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家户制、增量民主等。这些概念是“以中国为中心”和“以中国为方法”而构建的具有解释力的标识性概念,也是中国政治学学术共同体的身份标识。中国政治学研究应在已有成果基础上,立足中国式现代化,将历史、田野和比较带入中国政治学,推动话语体系和知识体系不断丰富更新,以解释“中国之治”的成功实践,并实现与西方政治学的有效对话,提升国际话语权。

三是在比较的视野中研究中国经验。比较研究既可以是哲学层面的思辨,也可以成为实证政治科学的研究视角。在人类认识复杂世界的过程中,已有的理论概念为政治学学科的构建与发展提供了丰富的理论储备,但社会科学具有民族性色彩,我们对国外的理论、概念、话语、方法,要有分析、有鉴别。将比较的视野带入中国政治学,能够探索和拓展有助于理解和阐释中国实际问题的政治学理论,形成可以与西方理论对话的标识性概念。比较的视野告诉我们,中国式现代化不是单一向度的现代化,而是协调全面发展的现代化,在遵循现代化一般规律的同时,突破了西方现代化发展的单一文明形态,实现了从物的现代化到人的现代化,从经济的现代化到全面的现代化的飞跃。比较的视野,有助于扩展人们对不同政治模式的认识,激发人们去发现和概括关于复杂政治现象的一般理论,从而获得中国政治学的标识性概念。

当前,学科协作、知识共享、理论互补,成为一种新的发展趋势。我们应依托跨学科的协作,借鉴其他学科领域丰富的理论资源和储备,推进中国政治学在前沿领域的知识生产。中国政治学要担当起时代赋予的历史使命,充分运用人类创造的知识积累,立足中国,放眼世界,建立一套自主性的话语体系和知识体系,从而使各种政治学知识有机结合成完整的解释系统,为诠释“中国之治”贡献智慧支持。

(作者系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政治和法律教研部教授)

二是将田野带入中国政治学。我们的哲学社会科学有没有中国特色,归根到底要看有没有主体性、原创性。新中国成立以来70多年来,实现了世所罕见的经济快速发展奇迹和社会长期稳定奇迹,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实践证明,中国式现代化是植根中国大地、具有深厚中华文化根基、深得人民拥护的,具有强大生命力和巨大优越性,能够持续推动拥有14亿多人口大国进步和发展、确保拥有5000多年文明史的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有着坚实的实践逻辑,要求我们在田野中发现事实和问题,并进行独立思考,打造标识性概念。中国政治学的标识性概念应该是发现“真实”的知识,扎根中国现代化的实践并能够解释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它应该是被“相信”的知识,是认识主体所能够把握和相信的;它应当是被“确证”的知识,建立在科学严谨的论证基础上。

二是将田野带入中国政治学。我们的哲学社会科学有没有中国特色,归根到底要看有没有主体性、原创性。新中国成立以来70多年来,实现了世所罕见的经济快速发展奇迹和社会长期稳定奇迹,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实践证明,中国式现代化是植根中国大地、具有深厚中华文化根基、深得人民拥护的,具有强大生命力和巨大优越性,能够持续推动拥有14亿多人口大国进步和发展、确保拥有5000多年文明史的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有着坚实的实践逻辑,要求我们在田野中发现事实和问题,并进行独立思考,打造标识性概念。中国政治学的标识性概念应该是发现“真实”的知识,扎根中国现代化的实践并能够解释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它应该是被“相信”的知识,是认识主体所能够把握和相信的;它应当是被“确证”的知识,建立在科学严谨的论证基础上。

二是将田野带入中国政治学。我们的哲学社会科学有没有中国特色,归根到底要看有没有主体性、原创性。新中国成立以来70多年来,实现了世所罕见的经济快速发展奇迹和社会长期稳定奇迹,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实践证明,中国式现代化是植根中国大地、具有深厚中华文化根基、深得人民拥护的,具有强大生命力和巨大优越性,能够持续推动拥有14亿多人口大国进步和发展、确保拥有5000多年文明史的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有着坚实的实践逻辑,要求我们在田野中发现事实和问题,并进行独立思考,打造标识性概念。中国政治学的标识性概念应该是发现“真实”的知识,扎根中国现代化的实践并能够解释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它应该是被“相信”的知识,是认识主体所能够把握和相信的;它应当是被“确证”的知识,建立在科学严谨的论证基础上。

读经典 学理论

# 实现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高度的文明”

□ 贾丽民 赵天森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在总结概括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历史意义时指出,“党领导人民成功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对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和人类文明新形态作过相关论述,指出“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之间的辩证统一,一直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重要范畴。列宁在发表于《真理报》上的《迎接国际劳动妇女节》一文中谈道:“只有无产阶级专政,只有社会主义国家才能够达到而且真正达到了高度的文明。”这里所说的“高度的文明”,内在包含着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辩证统一。

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著作中,“文明”是人民群众物质生产实践活动的成果,是劳动人民智慧的结晶,是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的标志。马克思说,“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这是对物质文明的基础性作用的最好概括,指明了物质文明对精神文明起到基础性作用,为精神文明提供必要的物质前提和条件。恩格斯在致康·施米特的信中指出,“物质生存方式虽然是始因,但是这并不排斥思想领域也反过来对这些物质生存方式起作用”,这阐明了精神文明对物质文明的反作用,指明了精神文明能够作为物质文明建设提供有力且必要的智力支

还要大。”但资本主义有其历史局限方向。由此,马克思主义认为,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紧密联系、互为条件,它们都是人类的物质生产实践活动的产物,并统一于人的具体实践活动。

在具有“高度的文明”的社会,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必然是协调发展。把握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辩证关系,在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的基础上实现二者协调发展,是中国共产党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经验。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同志就指出,“我们要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发展高深的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发展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只有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都搞好,国家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都增强,全国各族人民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改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才能顺利向前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不仅要求物质生活水平提高、国家仓廪充实、衣食足,而且要求精神文化生活丰富、人人知礼明荣辱,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

一个社会的物质文明成果和精神文明成果,标志着这个社会所处的历史发展阶段。不可否认,资本主义作为一种社会形态,有其特定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并且在人类社会历史上起到过巨大的推动作用。马克思曾说:“资产阶级在它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

还要大。”但资本主义有其历史局限性,资本主义现代化发展模式有着自身无法克服的先天性弊病——资本对社会的宰制和控制。在资本主义社会,资本是经济社会运转的引擎,整个社会的财富、文化都在资本的“指挥棒”下发挥作用,并由此带来以下矛盾:生产能力的扩大与市场容量之间的矛盾,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个别企业生产的有组织性与整个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之间的矛盾,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等等。虽然当代资本主义在其现代化进程中实施了一些改良措施,暂时缓和了尖锐的社会矛盾,但是在无法摆脱资本逻辑的挟制这一根源性问题的背景下,这些变化并不能改变资本主义制度的本质,也无法克服其基本矛盾,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等只能周期性上演。

资本逻辑下利益至上的价值取向导致人的现实性(自由全面平衡)的丧失。在资本主义现代化发展模式中的,个人的生活目标就是掌握尽可能多的物质财富以体现其价值。资本逻辑导致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之间产生巨大的不平衡,致使人的价值取向和自我评价都以资本为导向,带有深深的“逐利性”色彩。强大的物质基础并没有给人们带来自由、全面、平衡的发展,相反,对物质的极度追捧使人的价值取向和自我评价都以资本为导向,体现为自我价值与社会价值的统一。这种形态的精神文明及其服务对象实质上仍然是资本,它并没有为人类带来文化需要的满足和精神世界的充盈。

如何克服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先天性弊病?如前所述,列宁给出的药

方是:“只有无产阶级专政,只有社会主义国家才能够达到而且真正达到了高度的文明。”在中国共产党带领下,社会主义中国以其创造性实践,开拓出一条实现“高度的文明”的新道路。一方面,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有助于克服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社会化大生产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最大限度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使国民经济得到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另一方面,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打破了资本逻辑对人类社会的宰制,在制度和政策层面驾驭资本使其成为现代化建设的手段工具,在思想观念层面强调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文明建设,广泛开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发展,使社会主义文明程度显著提高、人民精神力量不断增强。开启新征程,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要统筹规划、齐头并进。

大力发展物质文明为精神文明建设打下雄厚基础。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就要继续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增强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大力发展物质文明,就要坚持新发展理念,解决不平

衡、不充分问题,激活各类主体活力,更多更好地利用全球资源和市场,形成以创新为第一动力、协调为内生特点、绿色为普遍形态、开放为必由之路、共享为根本目的物质文明建设格局,进而为实现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生态更加美好提供有力支撑。

建设高度精神文明为物质文明发展提供动力支持。没有高度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精神文明建设要反映社会主义制度下人们的精神面貌、社会风尚。这就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文明建设,广泛开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发展,使社会主义文明程度显著提高、人民精神力量不断增强。开启新征程,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要统筹规划、齐头并进。

大力发展物质文明为精神文明建设打下雄厚基础。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就要继续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增强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大力发展物质文明,就要坚持新发展理念,解决不平

(作者均系天津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天津师范大学基地研究员)